

文章编号: 2095-5464(2018)01-0095-06

论身份与修辞活动

闫亚平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 分析了身份与修辞活动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修辞活动是修辞主体与修辞受体之间进行的调整或适用语辞,以尽可能圆满传递“情”或“意”的人际话语交流行为。这种行为必备4个基本要素:“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和“对谁说”。身份作为“‘我’是谁”的问题,贯穿于整个修辞活动的始末。

关键词: 身份; 修辞本质; 修辞活动

中图分类号: H 109.4 **文献标志码:** A

人类自语言产生就有修辞活动。因为每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希望自己的表达收到尽可能好的效果。修辞主体为了圆满传递“情”或“意”,在言语交际活动中会有意识地调整或适用语辞。这种调整或适用语辞的主观努力,便是修辞活动。修辞活动作为修辞主体与修辞受体之间进行的双向互动话语交流行为,必备4个基本要素:“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和“对谁说”。可见,身份作为“‘我’是谁”的问题,作为人们在社会环境中自然且必然的本能需求,贯穿于整个修辞活动的始末。

一、言语活动的修辞本质

1. “修辞”内涵的界定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把古往今来人们对“修辞”内涵的解说概括为广狭二义: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那么,到底是文辞还是语辞?陈望道先生指出,仅限于文辞只不过是“礼拜文言时期的一种偏见”,“在礼拜文言的时期,人们往往轻蔑语体,压抑语体,贬称它为‘俚语’为‘俗语’。又从种种方面笑话它的无价值。而以古典语为范围今后语言的范型。其实古典语在古典语出现的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口头语言,而所谓修辞又正是从这种口头语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中外,都是如此”,因此“必当坦白承

认所谓辞实际是包括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纸上的文辞”^{[1]2}。到底是修饰还是调整?陈望道先生进一步指出,专注于修饰“也只是偏重文辞,而且偏重文辞的某一局部现象的一种偏见”,“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在‘言随意遣’的时候,有的就是运用语辞,使同所欲传达的情意充分切当一件事,与其说是语辞的修饰,毋宁说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即使偶有斟酌修改,如往昔所常称道的所谓推敲,实际也还是针对情意调整适用语辞的事,而不是仅仅文字的修饰”^{[1]3}。

可见,“修”当为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为语辞解。修辞就是修辞主体在与修辞受体互动的基础上,根据题旨情境调整或适用语辞,形成各种修辞手段,以尽可能圆满实现交际目标的一种人际话语交流行为。

2. 修辞性是言语活动的本质属性

从陈望道先生对“修辞”内涵的界定,可清晰看出,修辞作为调整或适用语辞以尽可能圆满实现交际目标的人际话语交流行为,是言语交际活动中任何一个正常的、有理性的言语交际者都潜意识或有意识去遵循和追求的。因为,人类一切言语交际活动的背后都有动机的参与。而交际者作为深具主观能动性的有意识主体,具有追求交际效果尽可能优化的本能意识。所以,每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总会希望自己的表达收到

尽可能好的效果。可见,修辞作为人类理解环境的一种潜能,作为人类对语言应用效果的一种本能追求,是和语言同步发展起来的。

同时,语言的作用也不仅仅只是传递信息,而是为了人们彼此之间更好、更有效地沟通。因此,不管是有意识的言语交际活动,还是无意识或潜意识的言语交际活动,都关系到修辞。古人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语交际活动中,如果不能清晰地表达,不注重修辞,就不可能让对方知道、了解,当然更不用说传播久远、影响广泛。又云,“子贡曰: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诗》云: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夫辞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说苑·善说》)出言陈辞,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得失,还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如果人们注重修其辞,注重调整或适用语辞,不仅可以推重自身,保全性命,还可以得到君主的重视,甚至能安定整个国家。可见,言语交际是使同一社团成员之间达成“共同理解”并凝聚在一起的根本途径,修辞性是言语活动的本质属性。正常行为体之间的言语交际活动都为修辞活动。

二、身份和修辞活动

什么是身份?哲学意义上的身份是指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角色身份理论”认为,身份就是个体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社会身份理论”和“自我归类理论”认为,身份是个体对群体的一种认同倾向,是个人在社会情境中通过社会比较,以获得积极自我评价为导向而进行的自我归类。可见,身份的形成不仅取决于自我,还更多地受到自我与他者互动所处环境和互动进程的影响。它既是行为体自我认知的表征,也是社会的产物,是自我认知和社会文化语境中与他人互动交流的结果。此外,身份不仅要解决“我是谁”“他是谁”这样的个体身份问题,还要解决“我们是谁”“他们是谁”这样的社会身份问题。所谓个体身份是行为体根据自身独特属性,如个体的能力、态度、立场、价值观、情感、判断和人格特质等;团体的经营管理理念、文化精神、价值追求、奋斗目标等,对自我的定位是“我”和“非我”的归类。所谓社会身份,指的是行为体在社会情境中通过社会

比较,以获得积极自我评价为导向进行的自我认同,是“我们”和“他们”的归类。尤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建构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不仅具有多重性、动态性,还具有建构性的本质特征。正如钱超英指出,“对人来说,特性的确定性和统一状态不是一种固有的本质,而是通过其社会环境中不断和他身外的或未曾预料到的经验相遇,并把某些经验选择、转化为属于自身的东西,因此身份是一种建构的过程,是在演变中持续和在持续中演变的过程”^[2]。而话语,尤其是话语的策略性运用,即修辞话语,对身份的建构要比其他形式更凸显、更直接、更便捷、更经济,也更具有感染力和凝聚力。

1. 身份的准确认知是修辞活动的前提与起点

修辞活动作为修辞主体与修辞受体之间进行的调整或适用语辞,以尽可能圆满传递“情”或“意”的人际话语交流行为,其必备4个基本要素:“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和“对谁说”。其中,“谁在说”和“对谁说”对“说什么”,以及“怎么说”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比如:

例1 和李书记谈话以什么名义?公民?工人?下级?他儿子的战友?不,要以共产党员的名义!^[3]

例1中,修辞主体赵小民,在发现厂里存在一些问题后,打算同修辞受体厂党委李书记进行一番交谈。由于修辞主体与修辞受体之间存在多重身份关系,所以,在谈话之前,作为修辞主体的他,必须首先确定好究竟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进行沟通。因为,只有把身份确定好了,才能明确到底该说什么、怎么说。否则,修辞活动便失去了方向。

日常交际活动中,即使是同样的话语内容,由于修辞主体和修辞受体身份的不同,“怎么说”也可能很不相同。比如:

例2 子兴道:“……谁知自娶了这位奶奶之后,倒上下无人不称颂他的夫人,璉爷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例3 周瑞家的听了道:“我的姥姥,告诉不得你呢。这位凤姑娘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他不过。”

例2和例3的谈论对象和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但“怎么说”却大不相同。例2在遣词上,使用了“无人”“称颂”“夫人”“一舍之地”“极标致”“言

谈”“爽利”“心机”“极深细”“竟是”“万不及一”等这些比较典雅的词语。在造句方面,使用了一个结构较工整、缜密的长句,如下划线部分所示。而例3在遣词上,则使用了“风姑娘”“年纪”“行事”“出挑的美人一样”“模样儿”“少说些”“一万个心眼子”“赌口齿”“说他不过”等这些比较俚俗词语。在造句方面,以短句、散句为主,如下划线部分所示。在言语风格上,例2比较典雅,而例3则较为俚俗。这种在遣词用句和言语风格上典雅与俚俗的差别,跟两例中修辞主体和修辞受体身份的不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例2是修辞主体“都中古董行中贸易”的商人冷子兴和修辞受体知识分子贾雨村之间的对话,因而,说话难免有些文绉绉的。而例3是修辞主体贾府佣人周瑞家的和修辞受体贾府远房农村亲戚刘姥姥之间的对话,所以,讲起话来免不了充满俚俗语口吻。

《论语·乡党》曰:“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蹀躞如也,与与如也”。面对不同身份的人,孔子的话语表现是不一样的。可见,身份作为社会关系网络中“我”是谁及其所处位置的标志,无时无刻不参与到修辞活动中去。毫不夸张地说,身份是修辞活动不可或缺的关键参与者。作为修辞活动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修辞主体对自身、修辞受体身份及彼此间身份关系、身份距离的准确认知,对修辞效果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一旦认知不当,将会严重影响交际效果,甚至会带来颠覆性的不良后果。比如:

例4 “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26小时之后,官方新闻发布会终于在温州举行。当王勇平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之后,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又说出了另一句话,“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现代快报》,2011-07-27)

例4中,下划线部分的措辞,如果出现在一般聊天的场合,并没有什么不妥。而在这里却引起了群情激愤,转瞬之间,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发言人本人及整个铁路部门都被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之中。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后果?关键原因就在于,作为说话人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没有准确认识自身及听话人提问记者的身份。这时的他已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政府部门铁道部立场和观点的代表者,人们期待听到的是他所代表的政府部门的权威性言论,而不是一己不成熟

的私见。同时,提问记者在这里也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而化身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所以,说话人王勇平在回答中所说的“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这样内容的话语,是极其不符合其作为政府部门代表的身份的。相应地,在这样的语境下,“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中使用的“你”和“我”,也已不是对提问记者和他自身的称谓,而成了对群众代表和铁道部的称谓,成了老百姓和政府的称谓。于是,“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样极不符合双方身份的话语,使得老百姓和政府之间一致的身份关系顿时转化成一种对立的身份关系,令民众一片唏嘘,愤慨不已。

可见,修辞主体对自身、修辞受体身份,以及双方之间身份关系、身份距离的准确认知,是整个修辞活动的前提和起点。否则,“说什么”“怎么说”便失去了方向。

2. 身份及身份关系的构筑是圆满实现修辞目标的重要内容构成和手段

以 Aristotle 为代表的西方古典修辞学,把修辞看作一种劝说(persuasion)的技巧和艺术。以 Kenneth Burke 为代表的美国新修辞学,则认为修辞是通过言语在其他行为人身上形成态度或诱导行动,其目的在于实现认同(identification)。不管是“劝说”还是“认同”,修辞作为一种能够通过言说操控人类情感、态度和行为的力量,修辞主体对自身、修辞受体身份、身份形象,以及双方之间身份关系与身份距离的恰当、得体凸显、展现、塑造与建构,是实现修辞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构成和手段。因为身份作为行为体在社会环境中自然且必然的本能需求,与其情感、态度密不可分,并进而强烈影响到行为体的判断和行为。言语交际活动中,修辞主体对自身身份、身份形象,及其与修辞受体间身份关系的择优凸显、展现、塑造和建构,是使修辞受体建立起对其话语内容的可信性和好感、善意,继而顺利实现修辞目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桥梁与通道。比如:

例5 a.我是来自肯尼亚的黑人父亲与来自堪萨斯州的白人母亲的儿子。

b.我曾就读于某些美国最好的学校,也曾在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生活过。

c.我已经用无可争议的明确言词,严正批评了莱特牧师造成如此争议的不当言论。

d.由此,莱特牧师的评论不仅仅错误,而且挑起分歧。在一个我们需要合作如一的时候挑起分歧;在一个我们需要联合一起以解决一串巨大问题的时候加强种族紧张。

e. 为了接续前人的漫漫征途,一个追求更正义、更平等、更自由、更具关怀且更繁荣的美国之旅途。我选择在历史上的此时此刻参选总统,因为我深深相信除非我们共同努力,否则无法解决我们此刻面临的各项挑战;除非我们为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而了解到:我们虽然怀着不同的故事,但拥有相同的期待;我们可能外表不同且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都向往朝同一方向迈进,朝向一个让我们子子孙孙更美好的未来。

f. 但这正是我们的起点。我们的联邦就是从此茁壮。而正如这么多世代的人们,自一小群爱国者于两百二十一年前在费城签署那份文件后所了解到的,那就是追求更完美的起点。

g. “We the People,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就是为缔造一个更完美的联邦)(巴拉克·奥巴马《一个更完美的联邦》)

在历来存在种族冲突和歧视的美国,作为一名政治家,奥巴马的黑人身份备受关注,成为评论家和政治家调侃和攻击的对象与焦点。尤其是当奥巴马皈依的圣三位一体联合基督教教会的牧师莱特,在布道时发表的对白人极为仇视的种族主义言论被人拍下并被媒体公开,造成全美极大的震撼时,奥巴马选情一度落后告急。为了缓解身份危机,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支持,作为修辞主体的奥巴马,在演讲中,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诉诸人格”,进行自我良好身份形象的展现、塑造与建构。因此,奥巴马在大方承认其黑人种族身份的基础上,如例5中的a所示,又通过调整或适用语辞,积极进行自我良好身份形象的展现、塑造与建构,有力构筑出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备良好品质,且有着远大理想抱负、秉持正义公正的黑人政治家身份形象,从而诱导和激发广大修辞受体的积极情感反应,进而重新获得人们对其话语的信服,对其行为的支持。具体说来,在例5的b~g中,修辞主体奥巴马通过以下几方面表述成功唤起修辞受体的支持:①通过“最好”这样的显性正面评价性词语来修饰“学校”,表明其受过良好教育的身份经历;②通过“批评”这个表负面立场的标记动词和“不当”“错误”“挑起分歧”“加强种族紧张”等负面评价性词语,加上“无可争议”“明确”“严正”等增强语势词汇的修饰,有力表达了对莱特事件的负面社会评判,同时也表明了自身的立场、态度和远见卓识;③通过“更正义”“更平等”“更自由”“更具关怀且更繁荣”“更美好”“更完美”等这些正面评价性词语,既表达了其对美好未来

的坚定信念和决心,又表达了其对未来美国社会的正面社会评判,以帮助构筑其作为一个有着远大理想抱负和秉持正义公正的政治家身份形象;④通过“正是”“就是”等高质量表情态词语,传达了其对相关判断的果断性和断言性,有助于展现和建构其坚定信念、坚强自信和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身份形象;⑤通过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的频繁使用,把自身和广大修辞受体都包括在内,以此表明其是站在与广大修辞受体同一立场上的,既有助于塑造和建构其与广大修辞受体的同一立场身份,又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修辞主体的权势身份,有助于把其塑造和建构成一个与广大修辞受体团结一致、同甘共苦的“普通公民”身份形象;⑥通过引用美国宪法的法源《独立宣言》中的原话,如g所示,既凸显和体现了其对这一国家精神和理念的深深认同立场,也有助于通过此项受到广泛认可的建国纲领的诉诸,有力寻求、塑造和建构起其与广大修辞受体之间的“群内成员关系”,即同为建国纲领的认同者和坚守者,以有力唤起广大修辞受体的共鸣、好感与支持。可见,修辞主体对自身良好身份形象及其与修辞受体间积极正面身份关系的策略性凸显、展现、塑造和建构,既是圆满实现修辞目标的重要内容构成,也是圆满实现修辞目标的重要手段。它可以有力增强话语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有效诱导和激发修辞受体的积极情感反应,从而为修辞目标的圆满实现奠定坚实的情感和心理基础。

修辞活动的最终目的指向修辞受体,是对修辞受体进行规劝或形成态度、诱发行动。因此,修辞活动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修辞受体。对此,Aristotle提出了“情感诉求”,即设法将修辞受体带入某一情感状态之中,诉诸他们的感情,以产生说服的效力。在他看来,情感并不是影响人们做决定的非理性障碍,而是对不同情境和论辩模式的理性回应。刘亚猛也指出,“当人们处于不同情绪时,比如说感到悲哀或欢欣,友善或敌意,他们对同一件事作出的判断并不一样”,那么,“在修辞互动过程中想办法调节受众的情感,使之处于最易于接受说服的状态,因此是达到修辞目的的最有效手段之一”^[4]。而身份作为行为体在社会环境中自然而必然的本能需求,对修辞受体身份的恰当定位和建构,无疑是触发其积极情感状态的一个重要动因和手段。比如:

例6 1848年,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表哥阿尔伯特公爵结了婚。和女王同岁的阿尔伯特公爵比较喜欢读书,不大爱社交,对政治也

不太关心。

有一次,女王敲门找阿尔伯特。

“谁?”里面问道。

“英国女王。”女王回答到。

门没有开。敲了几次后,女王突然感觉到了什么,又敲了几下,用温柔的语气说:“我是你的妻子,阿尔伯特。”

这时,门开了。(尚劝余《西方人物的故事》)

例6中,修辞主体维多利亚女王和修辞受体阿尔伯特公爵之间存在多重身份关系:从血缘身份来看,一个是表妹,一个是表哥;从政治身份来看,一个是女王,一个是臣民;从婚姻身份来看,一个是妻子,一个是丈夫。当修辞主体维多利亚女王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女王”的同时,也就把作为修辞受体的阿尔伯特公爵的身份定位为一位臣民。而这种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的身份定位,显然严重影响了修辞受体的情感状态,于是,“门没有开”。而当修辞主体维多利亚女王意识到修辞受体的情感反应,有意识地凸显、激活了其多重身份中“妻子”的身份属性时,也就凸显、激活了修辞受体阿尔伯特公爵的“丈夫”身份。而这才是当前语境下修辞受体在两人多重身份关系中所乐意接受的身份关系,触发了其积极的情感反应,于是“门开了”。可见,对修辞受体身份的恰当定位、凸显、激活和建构,可诱导和激发修辞受体的积极情感反应,从而为修辞目标的顺利实现奠定坚实的情感基础。

心理学相关研究表明,在人际交往互动中,人们“见到‘自己人’会感到亲切,与‘自己人’打交道会觉得方便和放心,信息流通在‘自己人’之间也会远比普通人之间传播得快……凡此种种,其实都是‘自己人效应’在起作用”^{[5]100}。这种“自己人效应”,在人际交往互动中发挥着强大的肯定而积极的效用,“通常会使得人们做出正面的、肯定的反应和评价,如友好的态度、合作的精神、愿意亲近的姿态等等”^{[5]101}。因此,在言语交际活动中,修辞主体通过调整或适用语辞,塑造和建构双方“自己人”身份立场和关系,也能有效触发修辞受体的积极情感反应,以有助于修辞目标的顺利实现。比如:

例7 (老师对一个学生说)你要记住,我们是学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

例7中,由于话语内容为训导、告诫性的,相对来说比较消极,容易引发修辞受体的抵触乃至反感。为了顺利实现修辞目标,作为修辞主体的

老师,通过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一词的使用,把自身也包括在内,有力传达和展现了其是站在与修辞受体同一立场上的,是“自己人”,大大拉近了彼此间的身份距离,从而能够有效诱导和激发修辞受体的积极情感反应,为修辞目标的圆满实现奠定良好的情感和心理基础。

总之,言语交际活动中,修辞主体对自身、修辞受体身份、身份形象,及双方之间身份关系与身份距离的择优凸显、激活、塑造和建构,既是实现修辞目标的重要内容构成,又是实现修辞目标的重要资源和手段。

3. 身份信息是修辞话语蕴藏的一个重要内涵

身份之于修辞活动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可以从话语中推断出相关的重要身份信息。这也是人们对修辞话语进行解读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

例8 a. 葛天谈老公刘翔退役:我会祝福他他会很好的(新华网,2015-05-20)

b. 我会祝福他 他一定会很好的(光明网,2015-05-21)

c. 葛天回答得很客套:我会祝福他(山西新闻网,2015-05-21)

d. 被问及刘翔退役 葛天称:我会祝福他(《襄阳晚报》,2015-05-21)

例8中,说话人原本作为刘翔的妻子,当被问及刘翔退役一事时,葛天的这句回答立即成了各大新闻报纸和新闻网站的标题。为什么选择这句话作为标题以吸引受众眼球呢?就在于人们从这句话中听出了其中蕴藏的关键身份信息。虽然此前外界对刘翔和葛天的婚姻状况有诸多猜测,但是这句回答使这诸多猜测浮出水面,爆发而起。作为最亲密的爱人,“飞人”刘翔的妻子,葛天的这句回答,如a~d下划线部分所示,不管是有意还是潜意识,确实非常不符合其与当事人的夫妻身份,正如很多新闻报纸和新闻网站所评价的“如同路人甲一样”“客套的一个回答”。于是,人们从这句回答中,猜测出她和刘翔的婚姻一定出了问题,甚至可能已经离婚。而人们从这句话读出的身份信息,也很快在之后的一个月被证实。可见,说话人的“说什么”和“怎么说”中其实蕴藏着重要的身份信息,不容忽视。身份与话语在每一个社会举动、社会事件和社会群体中紧密相联。

4. 良好身份形象及身份关系的建构本身也是修辞活动的目标之一

言语交际活动中,修辞主体对自身、修辞受体

身份、身份形象,及双方之间身份关系及身份距离的恰当、得体凸显、展现、塑造与建构,不仅是实现修辞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构成和手段,本身也是修辞活动最终要实现的修辞目标之一。

言语交际活动中,修辞主体不仅仅要尽可能圆满地传递“情”或“意”,真正的成功还在于展示、构筑其良好的身份形象,或保持、巩固、建构其与修辞受体间的积极正面身份关系。就每个人来说,终其一生所追求的,也不过是在与周围人的互动中,通过调整或适用语辞,来对自身的身份形象进行不断调整、不断改进、不断构筑,以给他们留下独特的身份形象之印象,或者通过调整或适用语辞,来调整和改善周边的人际关系,保持、巩固和建构彼此之间的积极正面身份关系。

综上所述,身份不仅是行为体在社会环境中自然且必然的本能需求,而且具有交际属性,贯穿于整个修辞活动的始末。任何修辞活动都离不开修辞主体与修辞受体。没有修辞主体与修辞受体的参与和互动,修辞活动就无从谈起。因此,修辞主体、修辞受体的身份及双方之间的身份关系、身份距离,不仅是开启修辞活动不可忽略的一个重

要要素,更是整个修辞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圆满实现修辞目标的一个不可小视的关键资源和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修辞活动中有时还涉及第三方行为体身份的修辞认知、展现、塑造和建构问题。)修辞主体对自身、修辞受体身份,及双方间身份关系与身份距离的恰当、得体认知、展现、塑造和建构,既是修辞活动的前提、起点,又是圆满实现修辞目标的重要内容构成、手段,也是修辞话语蕴藏的重要内涵及修辞活动最终要实现的修辞目标之一。

参考文献:

- [1]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 [2] 钱超英. 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17(2): 89-94.
- [3] 陈汝东. 修辞过程中的话语角色选择与调整[J]. 汉语学习, 1996, 93(3): 31-34.
- [4] 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57.
- [5] 张建雄. 人际关系新思维[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王立坤】

Identity and Rhetorical Activities

Yan Yap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s of identity and rhetorical activities were analyz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rhetorical activity is the adjustment or application of rhetoric between the rhetorical subject and the rhetorical subject in order to transmit the communication of “affection” or “intension” as much as possible. This behavior must have four basic elements: “who is saying”, “what to say”, “how to say” and “to whom”. Identity as a question of “who am I” runs through the whole rhetorical activity.

Key words: identity; rhetorical essence; rhetorical activity